



# 钱瑛：传奇革命女杰

钱瑛(1903—1973)，湖北咸宁人。1923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，1927年3月加入共青团，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投身革命后，参与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，曾担任中共潜江县委书记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先后任湖北省工委委员、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、中共湖北省委书记、鄂中区党委书记、湘鄂西区委党委书记、南方局西南工委书记等职。抗战后历任中共中央重庆局、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、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、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。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任监察部部长。



钱瑛

钱瑛10岁时便随父亲到潜江读书，后进职业女校补习。其间由父母包办将她许配了人家，钱瑛执意不从，曾数度奋起抗争。在依然得不到家中的同情时，她竟用剪刀刺喉自杀，幸被人发觉，抢救及时，才幸免一死。母亲见她秉性如此刚烈，难移其志，只好将其婚事放下，允许她到省城求学。

钱瑛来到省会武汉，在族叔钱亦石(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、国际问题专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)的支持下，她满怀信心地投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。经考试，成绩优异。按女师当时情况，即使择优录取也不成问题。但校方节外生枝，竟以钱瑛缠足不便操为由，不予录取。求学若渴的钱瑛怎经得起这种意外的打击！她得知这一消息时，感到非常失望，几乎痛不欲生，意欲投井自尽，幸得姐夫极力劝阻。钱亦石一方面对她进行开导、鼓励，另一方面又向学校交涉，并指出钱瑛的全部考试成绩均属优异，学校这样拒招，既影响女子学业前途，更影响省立女师的声誉。经钱亦石据理力争，钱瑛终于被录取到省立女师就读。

1923年冬，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主编的《中国青年》刊物问世。该刊常用马列主义理论教导青年投身革命，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。钱瑛阅读该刊后如同在黑夜中见到了启明星，加上平时钱亦石、李汉俊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影响，她决心献身崇高而伟大的革命事业，1927年初，24岁的钱瑛在省立女师毅然加入青年团。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后，党组织把钱瑛送到汉口劳动训练班受训，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任组织干事。这时，国民党叛变革命。“七·一五”后，白色恐怖笼罩九江，党组织指示她迅速离开岗位。钱瑛难以舍弃刚开辟的工作，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，她才机智地从后窗逃脱。党组织派她参加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因起义受挫又转赴广州，在叶剑英、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。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形势更加险恶，钱瑛与部队失去联系。虽孤身一人，但她感到共产党人肩负的重任，决心逃出广州。

正当她身无分文的时候，幸在广九站偶遇几位湖南籍士兵，念她是单身女子，他们便凑了一些钱，开了路条，劝她回家。钱瑛决心继续寻找党组织。情急之下，见有民船，便匆忙跳了上去。上船后她才发觉船舱里竟都是女人，一个个愁眉苦脸。钱瑛不解何故，经暗地询问，方知这是一艘贩卖人口的黑船。钱瑛不甘苟活，她急中生智，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，幸被一渔民救起，她又继续往前赶路。当晚投宿小客店，不料隔壁房中有两个坏女人，见她是一个单身

弱女子，暗暗打她的坏主意，后又怀疑她是共产党，意欲拿她报官请赏。

钱瑛面对敌人，身处险境，决心智斗。于是，她连夜在手上写了一首仿《木兰辞》。大意是：未婚夫亡，立志守节，劫父外出投亲，路遇土匪，父被打死，财物被劫，虽处绝境，其志不移。她把自己扮成节孝女子。第二天乘车，那两个坏蛋果然跟踪着她。在车上她被乘警搜查票搜身，除发现她的那首《木兰辞》外，一无所有。他们将她带回车站，不料车站站长和税务局局长见了，还颇为赞赏她的《木兰辞》。他们认为，像这样一位立志于“节孝”双全的女子，不会是共产党，便把她放了。

钱瑛凭着自己对党的忠诚和智慧，逃出广州后，她辗转跋涉，历尽艰辛，到了香港，终于又找到了党组织，开始在广东省委恽代英领导下工作。不久，党又派钱瑛去上海。

钱瑛到沪后，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。在这里，她结识了全总秘书长谭寿林。谭系广西贵县人，早年毕业于北大文学系，人品高洁，学识渊博。1923年入党，后任广西梧州特委书记，1928年到上海。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识，又从相知到相爱，最后终于结成伉俪。他们俩志同道合，决心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

刚刚度过新婚蜜月，钱瑛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。这期间，钱瑛因反对党内错误倾向而受到不公正的处分，被罚到工厂农村劳动。尽管如此，倔强的钱瑛毫不气馁，仍然满怀信心地抓紧学习。有时还夜以继日，打着电筒在被子里看书。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导师列宁的《进一步，退两步》等经典著作，其中主要章节内容她都能背诵下来。在苏联，钱瑛就是这样顽强地坚持学习，努力获取革命知识的。

1931年春，钱瑛学成回国，和谭寿林久别重逢。不久，组织派他俩到湖北洪湖苏区工作。正待启程，不料总工会遭敌人破坏，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，让钱瑛先期赴洪湖。情况紧急，钱瑛刚走，谭寿林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。在狱中，受尽酷刑，坚贞不屈。同年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。

噩耗传来，正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钱瑛万分悲恸。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，加倍努力工作。不久，她加入根据地领导班子，任潜江县委书记，领导农民“打土豪分田地、反渔霸、抗洪水”，建立游击队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。

1932年5月，红三军向襄河北岸出动，川军范绍曾部企图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。当时，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，形势十分危急。在这紧要关头，钱瑛率数百游击健儿，绕到敌后，发起突然袭击，大挫敌军。此时，我红三军趁势赶回，将敌全歼。著名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所描写的历史背景，便是这一辉煌战绩。

1932年秋，洪湖苏区大部失守。钱瑛被派去做(州)潜(江)失败后的恢复工作。钱瑛受命后连夜赶到，不料那里已准备撤退。撤退时，钱瑛和大家几度冲过敌人的封锁线。由于情况复杂，原同行的人大部分走散，钱瑛又成孤身一人，多次遇险，被一白军抓住。钱瑛心想，此番身陷绝境，料难脱身。

钱瑛知道，自己也即将面临敌人的严刑拷打，在这危急关头，她脑海中闪过丈夫的身影，闪过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点点滴滴。她攥紧了随身携带的旧怀表，那是谭寿林送给她的定情之物。

当钱瑛被押解的囚车驶向未知的



1943年，钱瑛(右五)与中央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合影。

黑暗中，她悄悄将怀表藏入衣襟，紧贴胸口。这冰冷的金属仿佛有了温度，鼓舞着她去克服内心的恐惧。

但是，倘若这块怀表落入敌人手中，难保他们发现自己和丈夫的关系。她在心中暗暗盘算着脱身的计策，终于找准时机，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要求方便。

虽有特务紧随，她还是巧妙地甩脱视线，将怀表投入草丛深处。她只听得一声轻响，那块见证了她和丈夫爱情的怀表，便永远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中。

囚室里，钱瑛受尽折磨。敌人变着法儿审讯她，要挟她交代身份，供出组织，可无论对方如何威逼利诱，钱瑛始终一言不发。

谭寿林曾经和她说过，只要坚持信念，无论历经何等磨难，终有重逢之日，这个诺言，成了钱瑛在狱中唯一的慰藉。她相信，只要这颗赤诚之心还在跳动，希望便不会断绝。
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国共两党联合抗日，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南京向国民党交涉，点名要求释放共产党“政治犯”。钱瑛因化名彭友姑，初未认出，直到最后才获释，重新回到党的怀抱。

钱瑛出狱后，即赴湖北，先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，后代理书记。此间曾和方毅等同志在七里坪举办干部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。武汉失守后，她先后任鄂中区委、湘鄂西区委书记。1940年后调任中共中央南方局，任驻川东特委代表、西南工委书记。以后又相继任中

共中央重庆局、上海局、南京局组织部部长，以协助周恩来、董必武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。

1949年5月16日，武汉解放。周恩来主持召开南下领导干部会议，部署南下任务。时年46岁的钱瑛被任命为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。干部南下后，华中局改为中南局，钱瑛任中南局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，并兼任中南局妇委书记、妇联主任、纪委会副书记、军政委员、人事部长等要职。

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部长，集多种要职于一身，可谓大权在握，但她从不摆官架子，十分平易近人。她既是湖北本土人，又在武汉和湖北地区长期领导革命斗争，亲朋故旧很多。但不论是谁找她，不论什么问题，她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原则秉公处理，不讲私人情面。

钱瑛担任诸多公职，这不仅是个权力象征，更重要的是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期望，也是她肩负的一种责任。她虽然历经失去丈夫和女儿(从小夭折)的人生悲痛，但她没有丝毫消沉气馁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为革命事业奋力拼搏。

钱瑛身居高位要职，当官为民。她为维护党纪和政纪的尊严而呕心沥血，并为党纪政纪的整顿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她不仅关心爱护干部，而且时时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。

钱瑛有一句口头禅：“不怕鬼！”在任何情况下，她都不趋炎附势，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打击坏人，保护好人。在“文革”初期，江青、康生一伙心怀鬼胎，要为刘结挺、张西挺翻案，责难中央监委，甚至大骂监委“监到老子头上来了”。面对江青、康生的淫威，钱瑛依然威武不屈，刚正不阿，从不改口，直至被迫害致死，也没拿党的原则做交易。

(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、中国妇女网)

## 周恩来：给运动员“敬菜”

1961年4月，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，我国代表队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三项冠军。比赛结束后，周恩来在特意设宴招待他们。

4月21日这天，运动员们整整坐了两大桌，总理安排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邱钟惠坐在他身边。等菜上齐了，总理起身对大家说：“我今天不能向你们敬酒，就敬菜。这几个菜是我特意让厨师做的，是我们淮安的家乡菜。尤其是这盘‘狮子头’最有代表性，也是我最爱吃的菜，我还会做，就是没时间，不然我一定亲自为你们做。”说着把一只“狮子头”用筷子夹成四瓣，把其中一瓣夹到邱钟惠碗里。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## “江抗”第二路首胜黄土塘

1939年5月，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500余人在团长叶飞、副团长吴焜等率领下东进，与梅光迪、何克希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(简称“江抗”)第三路汇合，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，由梅光迪任总指挥，叶飞、何克希、吴焜任副总指挥。六团改编为“江抗”第二路，由吴焜任“江抗”第二路司令员。

此后，吴焜率领“江抗”第二路进入锡澄公路以东，沪宁铁路两侧的平原水网地区，一面开展抗日斗争，一面发展人民抗日武装，并相机创建游击根据地。5月30日，由吴焜率领“江抗”第二路主力部队王营春的第一营和廖政国的第二营，在清浦常熟东乡十多个日伪军据点及匪伪武装后，宿营在黄土塘镇东南不足500米处的小成上村子里。5月31日早晨，新四军一名炊事员来到黄土塘镇上采办货物，发现有日军乘船“扫荡”，于是火速赶回驻地报告敌情。

吴焜得到报告后，立即指挥一营和二营分头迎敌。一营营长王营春立即指挥部队火速进入小成上村河堤阵地，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。

不久，敌人向一营阵地发起冲锋。敌我双方在相距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激战。

激战至中午，日军援军带着大批伪军赶到，在炮火的掩护下再次向一营据守的阵地发起猛攻，很快突破了一营守卫的桥梁，向一营阵地扑来。一营指战员英勇抵抗，和冲进战壕的日伪军展开了白刃格斗，危急关头，二营营长廖政国率部赶到，以机枪、手榴弹冲向近前的敌人猛打，很快收复了阵地。

正当新四军部队与日军奋力激战之际，国民党顽固派的“忠义救国军”派出1个支队，从侧后发起偷袭。“江抗”部队临危不乱，立即组织力量予以反击。在新四军的猛烈火力打击下，顽军迅速溃败。

“江抗”部队经数小时激战，给日军、顽军以重大杀伤，毙伤日、顽军近百人，并迫使日军、顽军撤出战场。这次战斗，是“江抗”第二路获得的首次胜利，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，更增强了苏南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## 孙伏园为农民办报

1930年，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，让他到定县为农民主办《农民报》。

晏阳初对孙伏园说，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一次次陷入悲惨的境地，自己没有多大能耐，只是想为他们做点事情，这才心会安。然后，晏阳初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、1924年才学会编辑的《农民报》的《通用字表》给孙伏园看，这是一份3000字编成的通常用到的字表，从白话书报、旧戏剧、鼓词、《三字经》、发票、传单、告示、菜市账簿、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中挑出。

孙伏园接手《农民报》以后，改变了《农民报》最初的办报宗旨，读者对象由知识分子变成了农民。既然如此，《农民报》就要易懂得让农民可以看懂，所以，孙伏园提倡《农民报》使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。孙伏园在《农民报》的《民间》副刊上写下了这样一则广告：“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！”

《农民报》每期出两张，第一张的稿子由编辑撰写，主要内容包括本周重要新闻、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作品，所有的稿子全部注音。第二张采用的全部是农民的投稿，孙伏园允许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谐音字，还可以使用假借字以及注音符号。《农民报》上刊登的农民写的稿子带着农民鲜活的生活痕迹，其中还有许多注音和别字的，读起来令人捧腹。

为了让农民能订得起《农民报》，孙伏园把《农民报》的价格定得很低。晏阳初说：“《农民报》的目的，可以说是为使农民抒发舆论，唤起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，养成农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，和给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。”为此，孙伏园不断努力工作着。

《农民报》的别具一格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俞平伯和周作人也到定县参观农民报社，孙伏园给俞平伯和周作人介绍了有关情况，并带着他们四处走了走。4天下来，周作人写了《保定定县之游》一文，谈了自己的感受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## 富弼拒绝赠官

富弼是北宋大臣，曾任枢密使、宰相，可谓权高位重。他十分能干，在外交、赈灾方面对国家都有重大贡献。但他从不居功自傲，丝毫没有官瘾和权力欲，是北宋推辞掉皇帝升赏最多的一位高官。

有一回，辽国使者到宋朝来，向宋朝提出了割地、联姻等请求。皇帝授予富弼礼部员外郎、枢密直学士等官职，派他去和辽使谈判。富弼却说：“国家有急难，唯君命是从，这是为臣的职分，为什么要因此赠官爵呢？”坚决拒绝了赠官。

还有一回，富弼出使辽国回来，被授予翰林学士，但他坚辞不受。辽国使者对皇上说：“增金帛与辽和，非臣本志……愿陛下善修武备，勿忘国耻！”皇上又任命他为枢密副使，他仍坚辞不受。当时群臣都在殿外按班次排队，皇帝一定要富弼到枢密副使的位次上才就坐。并派宰相告诉富弼说：“这是朝廷专门任命，而不是你出使辽国的缘故啊！”富弼万不得已，这才接受了升赏。

皇佑元年，河北发生了大水灾，流民不断地涌入京东路地区。富弼奉命主持救灾工作，在他的努力下，救活了50多万人，还招募了1万多名士兵。宋仁宗知道后十分高兴，派遣使臣慰劳富弼，并升任他为礼部侍郎。但富弼说：“救灾是地方官的职分，何必升赏呢？”对所授予的官职坚决不受。

富弼拒绝赠官的选择，让我们看到了他精神世界里的真实的一面。这样的选择、这样的人格修为，无疑值得我们为之投去敬仰的目光。(据《联谊报》)

## 战地记者郑文亮的革命生涯

浙江省江山市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革命军人的档案资料。该档案是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五师政治部发给江山县人民政府，要求给予郑文亮家属优待政策的文件。

郑文亮，1922年出生于江山贺村，1949年2月参加了金萧游击支队，5月成为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军政大学学员。毕业后，他随第十二军挥师大西南，担任军政治部摄影组组长。作为一名随军摄影师，郑文亮用相机为邓小平等部队首长拍摄并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。

1949年11月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。

当时，郑文亮在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政治部担任随军摄影师。在部队行军途中，军机关有6个伤员掉队，军长王近山命令他尾随部队，边摄影边照顾这6名伤病员。其间，郑文亮给邓小平和在长征初期给毛泽东当炊事员的张师傅拍了合影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已经退伍并调入西南画报社工作的郑文亮听说部队将赴朝鲜，他多次打报告，希望回到原部队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后来，他被任命为第十二军三十五师摄影组组长。在朝鲜战场三年多时间里，他作为战地摄影记者，为五次战役、金城阻击战、上甘岭战役等战斗留下大量珍贵的相片。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黄继光烈士的

母亲郑芳芝到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时，郑文亮给烈士母亲拍了照片。黄妈妈听说郑文亮从小失去父母、后来参加部队的情况介绍后，特意和郑文亮合影，并在送给他的照片上写下“你也是我的儿子”的题款。

1954年郑文亮从朝鲜战场回国后，被分配到江西上饶部队办的军人摄影室工作。

1959年，为响应党的“精兵简政”号召，他回到浙江省江山市敦坪乡务农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郑文亮在江山市四都乡开办了四都照相馆，拿起相机，继续为人民服务。

(据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)

